

近代僑政研究

袁 丁 著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品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近代僑政研究

著 者：袁丁

出版發行：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

電 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 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 刷 者：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字 數：二十二萬字

定 價：港幣六十八圓

二〇〇二年一月初版 香港

ISBN: 962 - 450 - 513 - 6/D·43482

內 容 提 要

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中外關係的急劇變化，清王朝的對外政策也發生巨大轉變。由于晚清時期中國人大量出洋謀生并成為合法化行動，由于海外華僑華人日益成為中外交涉的重要內容，清政府日益重視僑務。并且，逐漸改變了過去傳統的敵視華僑的觀念，漸次重視華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作用，從而將僑務政策由鄙弃和敵視華僑，轉向積極保護和爭取華僑及其資本。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晚清政府不能有效實施其護僑政策，相反，常常在對外交涉中以清政府的被迫退讓而告終。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西方列強所執行的殖民主義侵略政策，和中國所處的半殖民地弱國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應當指出，晚清僑務政策的轉變，是在一部分“開眼看世界”的洋務派官員和駐外使領人員、沿海督撫等促進下發生的，而西方駐華外交及領事官員，以及一些受雇于清政府的外籍官吏和顧問，也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作用。晚清僑務政策的演變，伴隨着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近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政策轉變的趨向，是西方化，即借鑒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海外僑民的政策，并引入國際法觀念，從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各個方面對僑務政策進行徹底變革。晚清的對外遣使設領、頒布國籍法、積極吸引華僑投資國內、以及宣布保護國外及歸國華僑等行動，正是這種變革的標志。

目 錄

近代僑政研究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學術史回顧·····	(1)
第二節 方法論及意義 ·····	(10)
第二章 清末拐匪治罪法規的演變 ·····	(19)
第一節 清政府的國人出入境政策 ·····	(19)
第二節 華工出洋與拐匪治罪法規 ·····	(24)
第三節 合法化招工背景下的管理制度 ·····	(34)
第三章 晚清駐外使節派遣與護僑 ·····	(50)
第一節 清政府遣使設領態度的演變 ·····	(50)
第二節 駐外使領館的設置 ·····	(59)
第三節 清末駐外使節的活動 ·····	(76)
第四章 近代華僑國籍問題·····	(113)
第一節 清廷華僑觀念的演變·····	(113)
第二節 光緒初年有關華僑國籍的交涉·····	(117)
第三節 《大清國籍條例》的頒布與外交·····	(125)
第五章 光緒年間的中美工約談判·····	(140)
第一節 早期中美華工交涉·····	(140)
第二節 清政府對美國排華的反應·····	(147)

第三節 抵制美貨運動前后的中美工約談判·····	(156)
第六章 結束語·····	(175)
參考文獻·····	(185)
附錄：·····	(204)
一、清末徐銳的南洋招股與中國振興商務大公司的破產 ··	(204)
二、《三州府文件修集》初探 ·····	(215)
三、馬六甲青雲亭研究 ·····	(223)
四、緬甸瓦城華僑觀音寺研究 ·····	(237)
五、東莞却金亭碑考 ·····	(244)
六、聞良輔出使暹羅小考 ·····	(256)
后 記·····	(26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學術史回顧

華僑歷史的研究是中外關係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學術界對此研究由來已久。^[1]在民國時期，對華僑及其歷史的研究較為重視，這是因為孫中山及早期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軔于海外，與華僑息息相關。在推翻清王朝創立民國的過程中，海外華僑曾經起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孫中山先生常說：“華僑為革命之母”，充分肯定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民國成立后不久，便陸續出現許多研究華僑及華僑歷史的著作。20 世紀 20 年代下半葉是華僑研究的起步階段，陳起森《華僑寶鑑》（1925 年）、薛平山《華僑與革命》（1926 年）、李長傳《華僑》（1926 年）和《南洋華僑史》（1929 年）、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1929 年）、龔為遂《中國民族海外發展狀況》（1929 年）等，就是早期較有分量的專門著作。

20 年代諸書中，比較有學術價值的是李長傳、溫雄飛等人的著述，他們開創了中國國內對華僑史的區域性研究，把重點放在華僑最為集中的東南亞地區，從而取得較深入的成果，揭示了華僑史上許多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

30 年代至 40 年代，國內對華僑歷史的研究繼續深入，出現大批專著、譯著和論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劉鑑宣、束世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 年）、李長傳《中國殖民史》（1937 年）、張相時《華僑中心之南洋》（1937 年）、姚楠《馬來亞華僑史綱要》（1943 年）和《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1946 年）、陳里特《中國海外移民史》（1946 年）、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1947 年）、丘守愚《東印度與華僑經濟發展史》（1947 年）等。其中，李長傳《中國殖民史》一書，是在其早期對南洋華僑史研究的基礎上擴展而成，可

作為 1949 年以前國內華僑歷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在書中,李長傳分析了中國海外移民的地理、經濟、社會、和政治諸背景,並將華人向國外移居劃分為若干個時期加以系統分析,在許多問題上都有獨到的見解。雖然此書如同時期的多數著作一樣,存在用大國沙文主義觀點將華人移居海外類比于西方的“殖民事業”、把羅芳伯在加里曼丹建立的“蘭芳公司”稱為“獨立國”等不恰當的觀點,但時至今日,仍不失為研究華僑史的有價值的參考書。另外,陳達繼 20 年代在美國出版專著《中國移民》^[2]后,又在 1937 年出版《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從社會學和人口學的角度研究華僑歷史和現狀,使人耳目一新。特別是該書從實地調查入手,大量利用方志、族譜、口述史料、調查報告等材料,在資料引證方面別具一格。其分析華僑出國的背景和僑鄉的社會生活方面有許多精辟論述和細致的考察,不失為利用綜合學科研究華僑史的代表作。

除了專著和譯著外,20 世紀初至 1949 年,國內許多報刊都發表過有關華僑歷史研究的論文。尤其是《南洋研究》、《東方雜誌》、《中南文化》、《華僑半月刊》、《新亞細亞》、《南洋情報》、《僑務月報》等刊物,大量發表了中外學者對於華僑史的各種考訂,成為這一時期華僑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張星烺^[3]、李長傳^{[4][6]}、許雲樵^{[5][7]}、羅香林^{[8][9]}、廖綱魯^[10]、劉士木^[11]、管仲方^[12]、張維華^[13]、饒宗頤^[14]、何啓拔^[15]、謝雲聲^[16]、蘇鴻賓^[17]、陳育崧^{[18][19][20]}等人的論文,從大量中外文歷史文獻中,追根尋源,詳加考證。用充分的論據澄清了華僑歷史上許多的疑點,顯示出扎實的史學功底,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總的來說,民國時期的中國國內對於華僑歷史的研究因資料和戰亂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基本上處於初始階段。有關學者大多注重考訂、收集和整理史料,或者側重于現狀而對歷史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對清朝華僑政策的研究較少。而且,文字常常過於偏

激,表現出新舊政權交替前後,學者們對舊政權歷史的強烈的否定態度,馮自由等人的著述即為典型。

相對而言,國外對華僑歷史的研究要早於中國國內的相關研究。

早期國外有關華僑史的著述多出自西方殖民官吏、外交官和領事官員之手,如 1885 年荷蘭人德·赫魯(J. J. M. de Groot)所著《西婆羅洲華人公司》、範·珊迪克《海外華人》(1909 年)等書研究了華人移居荷屬印尼的歷史。^[21]美國人西華德(G. F. Seward)的《中國移民》(1881 年)極力鼓吹為了美國的利益,應該盡量為華工開放美國西部,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22]此外,惠特尼(J. A. Whitney)發表《華人與華人問題》(1888 年)也帶有同樣強烈的政治色彩。^[2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法、荷、日諸國在華僑歷史方面做了大量調查研究,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倫敦)及其華北分會(上海)、海峽分會(新加坡)、倫敦大學遠東及非洲學院、法國巴黎大學漢學院、法國河內遠東學院、荷蘭萊登大學漢學院、荷蘭巴達維亞學會等機構都先後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尤其是日本政府基於侵略戰爭的需要,於 1938—1943 年間,通過各種公開或秘密的研究機構,派出大批研究人員,在東南亞各地從事調查,出版了共 104 種、總題為《華僑調查研究》的有關東南亞華僑的研究報告,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24]

二戰前西方對華僑華人歷史的研究,較之中國學者要深入。其長處在於對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研究,代表作有麥克奈爾的《海外華人》^[25]、坎貝爾的《華人苦力移民》^[26]、柯立芝《中國移民》^[27]、克萊門蒂《華僑在英屬圭亞那》^[28]、巴素《馬來亞華人》^[29]、卡托《荷屬東印度華人的經濟地位》^[30]、馬德豪斯《新西蘭華人》^[31]、成田節男《華僑史》、小林新作《中國民族的海外發展》、吳主惠《華僑的本質》、長野朗《華僑》、井出季和太《華僑》等。^[32]除此之外,海外華人學者宋旺相、林添佑等人的著述,也有相當分

量。^[33]上述著述，重視從個別區域或國家入手，綜合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理論，對海外華人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諸如華僑社會結構、華人同化意識、秘密會黨、華人信仰、華人教育、華人經濟等方面，無一不納入其研究課題之內，形成風格各異、內容充實的著述，覆蓋了華僑社會的各個方面。另外，在一些中外關係史專著中，如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也較多地論述了清代僑政問題。^[34]

從內容上看，戰前關於華僑史的中外著述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以研究華僑通史為宗旨，縱貫古今；另一類側重于研究某個特定地區或特定國家的華僑及華僑社會的歷史；第三類就某些專題如僑匯、華人私會黨、華人宗教、華工、華人社團等問題進行研究。但尚無專門研究清代、特別是晚清政府華僑政策的論著。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華僑史的研究明顯分為兩個時期。

以文革為界，1949—1976是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關於華僑歷史的專著、專書極少，除了政治性、通俗性著述外，只有寥寥幾本，如張人羽《美帝排華史》、丁則民《美國排華史》等，^[35]內容局限于美國華僑，而且分量比較小，政治性很强。值得一提的是卿如楫《美國侵華史》（第1—2卷，1952年），其中有關美國華僑和中美華工交涉的論述，大量引證美國官方檔案，是這一時期華僑史研究的力作之一。但是由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在華僑歷史方面的研究常帶有比較偏激的觀點，而且人為地設置了一些“禁區”，使有關研究者裹足不前。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朱士嘉編輯的《美國迫害華工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該書從大量的中外檔案中摘錄了許多人們過去所未見的第一手資料，至今仍是研究出國華工史的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這個時期的華僑歷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一些專題論文上，其重點是研究華僑史上的重大事件、華僑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以及華僑在中外友好交往中的作用等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包括：朱杰勤教授對 19 世紀印尼華工和印尼紅溪事件、田汝康對東南亞華僑、李永錫對菲律賓華僑、周連寬對美國排華、冼玉清及丁又、何玉疇對 1905 年反對美國禁約運動、蔡鴻生對豬仔華工、何肇發對洛杉磯華僑社會、何啓拔對馬來亞華僑、田汝康對 18—19 世紀的印尼華僑公司、郭威白對馬來亞華人經濟、江醒東對印尼華僑、張映秋對泰國華僑、羅耀九對印尼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段雲章等對改良派與革命派在華僑中的斗争、陳澤憲對 19 世紀的契約華工、陳文源及寶榮昌對古巴華工等的研究，^[36]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整理和綜合史實，並加以深入的理論分析。尤其是朱杰勤、陳澤憲、田汝康、丁又等人的論文，無論在史料上，還是理論上都有較大的突破，堪稱這一時期華僑歷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總之，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學者對於華僑問題的研究，從過去偏重於概況和現狀轉向歷史學的研究，並注重運用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從而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研究顯得比較沉悶，較多地受到政治形勢的干擾，尤其是文革十年動亂中幾乎完全陷入停頓。在這一時期研究過程中，很值得一提的有中山大學歷史系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曾經聯合派人於 1963 年赴廣東陽江的華僑農場進行田野考察，調查訪問了近百位歸國老華工，寫成 44 篇調查報告。此外，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曾在廣東 25 個市縣、福建 23 個市縣和上海市進行廣泛調查，搜集了大批華僑投資內地的史料，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後，中國史學界重又恢復生機。華僑歷史研究由於開始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逐漸地成為“熱門”。自 1977 年至今，歷史學界發表了大量有關華僑史的論文、譯文，並且出版了兩部印尼華僑史、一部《菲律賓華僑史》，這是 1949 年後內地出版的首批華僑史專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此同時，一大批論文集、資料集、

參考工具書等也先後問世。其中，陳翰笙主編的《華工出國史料匯編》(11冊)、方積根主編的《非洲華僑史資料選輯》、中山大學編輯的《華僑史論文資料索引》、鄭民等編輯的《華僑華人史書刊目錄》等書，以及大量海外學者的譯著出版，給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這一時期(1977—1988年)，老一輩學者繼續發揮了學科帶頭人的作用，先後發表一批高水平論文。如朱杰勤“十九世紀后期中國人在美國開發中的作用及處境”^[37]，依據中外公私文獻論述了清末大批華人移居美國，為美國經濟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事跡，以及華人在美受到虐待和排斥的經過，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研究此類問題的力作。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清末英國為南非金礦招募華工始末”、“歷史上的華工出國”等文，^[38]力圖挖掘新史料，對華工問題進行研究分析。何啓拔“馬來亞華族的形成問題初探”和韓振華“評論1740年吧城發生大屠殺中國人的原因”^[39]則是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引人注目的是，國內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嶄露頭角，成為華僑史研究中的生力軍。例如溫廣益等撰寫的《印度尼西亞華僑史》是建國后大陸學者出版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華僑史專著，它批駁了西方著作常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觀點，同時也力辟建國前我國同類著述中時見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試圖用理性的觀點探索華僑出現和演變的規律，以及華僑與祖國和僑居國的相互關係及其特點，內容充實，資料豐富，是國內華僑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朱杰勤教授主編的多卷本《東南亞華僑史叢書》已經出版發行了李學民、黃昆章著《印尼華僑史》和黃滋生、何思兵著《菲律賓華僑史》2冊，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白。此外，廈門大學林金枝對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以及華僑出國的研究尤具特色。他依據1950年代末有關研究人員在閩、粵、滬一帶實地調查得來的珍貴資料，對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背景、特點、作用諸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是

目前為止國內此專題研究的高水平代表作。同時，他發表的“福建僑鄉族譜中有關南洋華僑史的若干問題”一文，也是在實地調查基礎上，利用大量僑鄉族譜，深入研究福建華僑出國的原因、時間、特點等，並涉及華僑平均壽命與卒葬地等社會學問題，為國內同類撰述中少見，其史料的運用和立論的方法都使人耳目一新。^[40]

這一時期，國內學術界對華僑史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無論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如此。特別突出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在華工史研究方面，對於史料的發掘和利用，以及研究的區域和理論上，都有許多突破，徐藝圃、朱榮基、郝貴遠等人，率先使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珍藏的清代檔案，論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華工出國與清政府對外交涉的歷史事實，從而填補了研究上的空白點。^[41]另外，艾周昌、許永璋對南非華工，張鎰、李春輝、沙丁等對近代拉美華工的研究，都是屬於開拓性工作。^[42]吳鳳斌、桂光華等對南洋華工的研究，則力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加深入。^[43]其次，國內學術界對以前較少觸及的海外華人社會加強了研究，並且漸從一般性敘述，進入較深層次的專題研究，擴大了研究範圍，諸如華僑會館和社團、華僑人口變遷、華僑商業興衰等等，都陸續取得一定成果。^[44]對一向國內較為重視的東南亞華僑的研究，近年來仍有大量新成果問世，而且多發前人所未發，如金應熙對越南華僑礦工、許肇琳對下柬埔寨華僑、陳喬之對沙撈越華僑的研究，以及黃滋生、金雨雁、林遠輝、徐善福、黃錚等對東南亞各國華僑的研究，都頗具特色。^[45]另外，學術界還對以前研究不多的墨西哥、日本、朝鮮等國華僑做了初步探討。^[46]再次，這個時期華僑史研究的一個新特點是“區域研究”逐漸增多，人們已不滿足於一般性地論述華僑出國及其特點，而努力從特定區域即個別僑鄉着手，研究華僑特有的地緣色彩，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影響，從而把研究推向深入。^[47]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注意研究清末僑務政策問題，如蔡仁

龍、周南京等對華僑國籍問題的研究、方雄普對晚清吸收僑資的研究、曹前與郝貴遠對清政府在美國排華時態度的研究、林遠輝對清末設領問題的研究等等，都對華僑史研究中這一薄弱環節有所彌補。^[48]在各自文章中，不少研究者對傳統觀點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清末華僑政策中有許多積極因素，應予肯定。特別是近年來廈門大學莊國土發表一系列研究晚清華僑政策的論文，涉及南洋設領、爭取華僑經濟、華工出國、李鴻章與僑政變化的關係等多方面問題，立論新穎，內容豐富，是國內此專題研究的力作。^[49]但其使用材料略覺陳舊，且過于求全，面面俱到，使得許多問題討論不夠深入。

與內地學者不同，港臺與海外學術界自二戰后以來保持了發展的勢頭，在華僑史研究上沒有很大中斷。在中文著述中，張存武、李銳華、劉伯驥、龔珍吾、鄭瑞明、梁子衡、丘式如、文心嚴、陳荆和、陳臺民、盧冠群、宋哲美、宋晞、陳守亭、何瑞藤等人的論著，從各個不同角度研究華僑歷史，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50]1954至1979年，臺灣有關機構還編輯出版26集的《華僑問題論文集》，同時出版了多卷本的《華僑志》，內容包括世界各主要華僑聚居國。60年代起，東南亞華裔學者開始在華僑華人史研究領域嶄露頭角，其中柯木林、林孝勝、崔貴強、鄭文輝、黃枝連、陳臺民、鄭良樹、沈己堯、劉芝田、陳烈甫、陳孺性等為其皎皎者。他們與老一輩海外學者許雲樵、陳育崧等，在華僑史研究上多有建樹。^[51]海外學者注重發掘整理當地公私檔案，積極開展口述歷史研究和田野考察，將家譜、碑銘、方志、帳冊和華文報刊等當地特有的史料廣泛運用于研究之中，開拓了華僑史研究的新領域，并取得很大成就。

二戰后華僑史研究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美國日益成為西方國家研究華僑史的中心，研究課題遍及全球各地華人，但仍以對美國華人研究為最多。戰后，英、法、荷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宣

告結束，其各國內對東南亞及東南亞華僑的研究的熱潮隨之趨向冷卻。除了少數學者如皮耐歐、斯勞基、迪朗、巴素、布萊思、威爾莫特等推出一批有份量的作品外，相對來說比較沉悶。^[52]相反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學者，二戰後對華僑史的研究不斷出現新成果，如可兒弘明對苦力貿易的研究，接觸到“豬花”這樣一個罕為人知的課題，內田直作、管原幸助、須山卓、河部利夫、倉岡克行、中村孝志、鴻山俊雄、今堀誠二等人的著述，可代表戰後日本非華裔作者華僑史研究的水平。^[53]戰後西方華僑史研究，長于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常結合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方法，對華人社會的各方面進行深入探討，許多著述都出自作者第一手的實地調查，因而論證翔實，內容豐富，他們不僅把華人社會視作一個整體，而且還深入到其社會內部，考察其地緣、血緣、業緣的區別和影響。隨着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的衰落和民族國家的興起，西方學者高度重視華僑華人的同化問題，他們往往從區域研究和個案研究入手，由典型推向一般，這方面，施堅雅對泰國華僑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華僑社會的經典之作，至今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54]此外，魏安國、沃恩、亞歷山大、米凱爾、拉文霍特、雅克、威廉斯、理查德森、胡克、巴斯、米勒、斯圖凡特等人的著述，亦堪稱西方華僑華人史研究的代表作。^[55]另外，華裔學者的外文著述也占有相當比重，如游仲勛、李國卿、戴國輝、王賡武、顏清湟、黃存榮、李波平、蔡石山、宋旺相、麥禮謙、宋李瑞芳、王靈智、沈己堯、田汝康等，都曾發表有價值的專著，是研究華僑史不可不參考的。^[56]

近年來，艾文博、蔡石山、顏清湟等人各自發表有關晚清華僑政策的專著^[57]，是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上最詳盡的研究。尤其是顏清湟的著作，引用大量中外檔案，系統考察了清代華僑政策的演變，對許多傳統觀點提出質疑，在詳盡占有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不少新見解，代表國外晚清僑務研究的 80 年代水平。

第二節 方法論及意義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移居海外，在唐代已經見于史書記載。^[58]但大規模遷移出國，是在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的晚清時期。正是由于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才使歐美殖民主義者有可能大批拐賣、誘騙、綁架中國人民去開發其殖民地；同時，也是由于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與專制王朝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才使得中國農村破產，城市失業，大批勞動群眾被迫離鄉背井，出國謀生。自 1840 年至 1911 年間，中國沿海省份以及邊境地區的貧苦群眾，以空前大的規模涌向國外，人數達數百萬之多，足跡遍于全球，從而奠定今天海外華僑華人的基礎和規模。研究華僑史，特別是晚清華僑史，對於揭示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掠壓和壓迫，有着重要意義。

海外華僑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在歷史上長期地與祖國發生密切關係，尤其是近代時期，華僑對祖國的革命和建設起了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前後，華僑為推翻腐朽、反動的清王朝，提供了巨額經費約數百萬元。不僅如此，廣大華僑還積極投身民族民主革命之中，並為此獻出寶貴的生命，單是 1911 年 4 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中，就有 28 位華僑壯烈殉國。孫中山對此曾說：“我海外同志，昔與文艱苦相共，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歷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以長留于國人之腦海。”這是對華僑在近代革命史上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除此之外，近代華僑還投身于祖國的各項經濟、文化建設，興辦鐵路、礦山、工廠、商業，建立各式學校以培養人才，等等，為近代中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近代華僑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研究近代華僑史有利于我們今天宣傳愛國主義，並使之發揚光大，為當前經濟建設服務。

除此之外，研究晚清華僑史、特別是晚清僑政演變的歷史，有

助于我們今天僑務政策以至外交政策制訂和執行。歷史上，中國政府對海外僑民的政策，正是在晚清時期才發生重大轉變的。晚清時期，由於對華僑移居海外的情況逐漸有所了解，特別是近代國際法傳入之後，清王朝對於華僑的認識逐漸有了觀念上的巨大改變，從而推動了僑務政策的轉向，由敵視、鄙棄華僑，漸次變為關注和保護華僑，并在法律上確認華僑的中國國籍。在中國歷代王朝的對外關係中，華僑問題只是在晚清才漸漸演變成影響雙邊及多邊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實際上，晚清僑務政策的影響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除（如雙重國籍問題）。由此可見，這一課題的研究有相當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因為 1949 年後，我們對華僑歷史和現狀，對歷代王朝僑務政策的起源、發展和演變，缺乏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在左的干擾下，僑務工作曾一度造成重大失誤。今天對晚清僑政的研究，可以加強我們理論上、現實上對華僑問題的認識，從而為更好地制定和貫徹我國的僑務政策和外交政策奠定基礎。

研究近代華僑史，對於發展和完善近代史、特別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華僑是中華民族移居在國外的一部分，歷來是中外友好關係的紐帶和橋梁。在近代，大批華工移居國外，對開發和建設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和東南亞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和當地人民共同勞動，和平共處，促進了中外友好關係的發展，這是近代中外關係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但是，多年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對於近代華僑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僑務政策的研究不夠重視，造成許多空白和薄弱環節，與國外及港臺學者相比，有相當差距。因此，有必要加強這一個課題的研究，并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把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本文選取晚清僑政的幾個重要方面，即遣使設領與護僑問題、晚清華僑國籍問題、晚清政府對拐賣華工的政策及演變問題、清政府對美國排華的態度等問題進行探討，正象本章第一節所敘述的，國內學術界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而且常常囿于史料不足，